

達德學院

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唇齒相依。早於清末時期，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已利用香港自由港的政策為掩護，藉著香港交通網絡中心及中外貿易轉口港的便利，與內地及海外的友人保持通訊聯繫，並以香港後為勤基地支持革命運動的開展。至抗日戰爭初期，中國共產黨亦充份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，在港建立了統戰工作所需的文化基地。1937年12月，周恩



來在港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，由廖承志擔任主要負責人，次年更協助宋慶齡在港成立「保衛中國同盟」。1941年皖南事變後，中國共產黨進一步以香港為宣傳基地，協助國統區，包括桂林、重慶的左翼文人疏散來港。直至1941年年底香港淪陷，在東江縱隊的策劃下，廖承志、喬冠華、何香凝，柳亞子、茅盾、夏衍及梁漱溟等三百多名文化人陸續撤離香港，中共在香港建立的宣傳基地始趨沉寂。

抗戰勝利後，廣東區委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，重新在港建立文化統戰的陣地。1945年11月《正報》面世，這是戰後在港出版的第一份報章。1946年1月，《華商報》宣佈復刊，並由戰前的晚報改為日報的形式出版。1947年1月，原在上海出版的《群眾週刊》亦已遷至香港。中共中央在香港重新建立了新聞傳播的據點後，為進一步爭取文化的領導權，於1947年5月正式成立香港分局，直屬中共南方局，由周恩來親自指揮，下設香港工委，專門負責在香港、華南及南洋（今東南亞地區）進行文化統戰的工作。特別是在1946至47年間，蔣介石在中國內地打壓國民黨內的左翼份子及「民主黨派」人士，這些文化人士在內地既無以立足，相繼南下香港。當時經中共部署或間接指導來港的五百多位文化人，抵港時不少已有左派傾向。

在四十年代國共內戰初期，中共在港活動的宣傳對象是主要是海外華僑、國統區內的同胞及港澳人士，並為南下的「民主黨派」提供一個與中共合作的空間。為免遭受殖民政府的阻撓，中國共產黨並無意在港開展工運及學運等群眾運動。事實上，周恩來早於1941年在港創辦《華商報》時，便已作出「不用共產黨出面，不要辦得太紅、要灰一點」的指示。適值香港政府與國民黨在戰後因九龍寨城的治權而膠著，港府企圖扶持左派以抵消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影響力，多次以不干涉中國內部黨派鬥爭，以及不引渡政治犯為理由，拒絕驅逐中共和「民主」文化人士出境。在上述的有利條件下，中共於四十年代後期在港開設了為數不少的文化機構，包括報社、雜誌社、出版社、印刷公司及學校等，既可掩護來港工作的知識份子幹部，亦妥善解決了這批文化人的就業問題。

早於1946年初，中共在華僑商人的支持下，已透過「民主人士」出面在港辦學，包括香

島、漢華和培僑中學，為不少幹部提供了教師的職位，當中最為人熟悉的是具備大學規格的香港達德學院。達德學院的創辦，最早追溯至 1945 年 6 月，董必武在美國邀請著名教育家陳其瑗來港辦學，在中共廣東區委的領導下，該校於 1945 年 6 月正式定名為達德學院，校名取才自《禮記》中的《中庸》篇，「智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9 月，達德學院成立董事會，由居港的「民主人士」和知名人士組成，當中並無共產黨員，貫徹了中共在港的辦學作風。董事會通過以李濟琛為董事長，陳其瑗為院長，並由抗日將領蔡廷鍇借出屯門青山的瀧江別墅為校舍。達德學院經香港政府教育司口頭批准立案招生後，於 10 月 10 日開學，但正式的學執照要遲至 1947 年 12 月 18 日始獲補發。

在國共內戰時期，不少內地的著名學者在香港避居，這些文化人為達德學院提供了一時無兩的師資，當中包括了著名的歷史學家翦伯贊與侯外廬、政治學家鄧初民、教育學家黃煥秋、經濟學家沈志遠與千家駒、國際問題學家劉思慕、文藝理論家黃藥眠、哲學家胡繩及民族學家鍾敬文等。此外，學院及各系不時邀請在港的知名學者作專題講座，如郭沫若、茅盾、沈鈞儒及喬冠華均曾是座上客。學生方面同樣來自五湖四海，遍及內地的廣東、廣西、湖南、福建、江西、浙江、陝西、台灣、上海及北京等省市，亦有來自菲律賓、泰國、馬來亞、新加坡、越南、印尼及美洲等地的海外華僑子女，總計學生人數超過八百人。這些鴻儒大師及優秀青年因緣濟會，在內戰的陰霾下來到香港為達德學院締造了群賢畢集、桃李滿門的盛況。



至 1948 年底，達德學院在港剛踏進第三個年頭，國共內戰亦已進入最後的階段。在中共即將取得政權之際，香港政府加緊抑制共產黨的活動，包括了取締社團、禁止活動以至遞解出境。1948 年 12 月 22 日，港府在立法局(今立法會)更首讀通過《再行修訂一九一三年教育條例》，使教育司有權取締參與政治運動的學校和教師。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(今北京)解放後，港督會同行政局(今行政會議)，以「維護公眾利益」為理由，於 2 月 23 日下令取消香港達德學院的註冊資格。當時在港的「民主黨派」和知名人士在中共中央的整合下，已分批前往東北及華北的「解放區」，準備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。達德學院的學生亦多已離開校園，在廣州以至華南地區參加遊擊戰。達德學院從開辦至結束為時雖只有兩年多，但已完成了中共中央所賦與的歷史使命。

達德書院舉辦初期設有商業經濟系、法律政治系及文學哲學系，及後增設了新聞專修班和預備班；學制本來原是本科四年，至 1948 年改為三年制，與香港的大學制度接軌。課程分為基礎課、理論課和技術課三大類，由淺入深，透過單元化的科目方便個別學生在短期內完成學習，並配合革命的需要到內地參加武裝鬥爭及地下工作。同時，學院強調學生的理論水平及實踐經驗並重。《達德青年》、《達德新聞》及《海燕》等文藝刊物的出版，為該校的莘莘

學子了提供了社會實踐的機會。達德書院雖然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成立，但該校一直以「民主黨派」和「民主人士」主持創辦的面貌出現，在校務管理的方面亦實行「民主辦學」。學院成立了一個院務委員會，作為全校最高的行政管理機構，由書院的四名行政領導，三名教授代表及三名學生代表組成，每月開會一次，藉以聽取教授和學生們對辦學的意見，及時改進教學與管理工作。

達德學院在 1949 年 2 月 23 日被查封後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召開了善後會議，設法協助部分教師和海外回國的僑生乘船北上「解放區」，並由黨中央有關部門安排工作。商業經濟系的七十多名學生則轉學至灣仔的建中專科學院，學習金融及銀行專業；同年 7 月，該學院亦告關閉，這批學生全數進入遊擊區，組建粵贛湘邊縱隊財經大隊，協助華南地區的接收工作。

剩下多數學生則進入華南各縱隊，在遊擊區參加武裝鬥爭。事實上，早在 1947 年初第二學期開始，達德學院已有學生陸續離校參軍；至 1949 年該校關閉時，參軍的人數約有二百人，即全校學生的四分之一，當中更有 18 人壯烈犧牲，年紀最少的只有 16 歲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達德學校友在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、學校、新聞出版及文教科研的單位中各展所長，至九十年代各人年逾花甲時，才逐漸淡出服務多年的崗位。



1947 年郭沫若在學院演講

達德書院關閉後，倫敦傳道會(今世界傳道會)於 1952 年購入該校校舍，並借予中華基督教會作女宣教師訓練學校。同年 6 月 2 日，何福堂會所正式成立，以紀念香港第一任華人牧師何福堂而命名，並以此會作為教學及學生住宿的地方。1961 年，倫敦傳教會把會所的業權轉交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，此前成立於 1959 年 10 月的香港神學院繼續提供三年制的神學訓練。為求更集中地訓練教牧人才，香港神學院於 1962 年併入崇基神學院，(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)。在 1963 年 9 月，何福堂書院的新校舍落成啟用前，何福堂會所一度用作新生的臨時教室。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，該會所常用作各堂義工的退修中心及青少年的夏令營。1999 年，教會曾提議拆卸舊址及重建毗鄰的拔臣學校和何福堂書院，引起香港傳媒的廣泛關注。2004 年 3 月 26 日，何福堂會內的馬禮遜樓被列為法定古蹟，達德書院的舊址得以成功保留。

八十年代初，在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之際，身處廣州、香港、北京、廣西、福建及湖南等地的達德校友已互有聯系。1984 年 8 月 26 日，香港達德學院校友會在廣州成立，與會者有來自北京、上海、福建、廣西、湖南、雲南、河南、新疆及港澳地區的校友三百餘人，選舉了黃煥秋及匡吉為名譽會長，陳楓為會長，吳平、李萃君、梁木、鄭康明及陳中行為副會長。

1986年7月17日至19日，達德建校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在中山展開，增選了劉克奇、張琮、林濱、何銘思及陳悅文為副會長。其後，廣西、湖南、福建及北京等校友會相繼成立；上海、江蘇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北、河南及新疆等校友較少的省市，亦在南京成立了內地聯合校友會。各校友會不僅定期出版紀念刊物，更把五湖四海的校友們聯繫起來，把無私的達德精神繼續發揚光大。